

杏园初宴曲江头

雁塔题名时 共赴曲江宴

——古人金榜题名后的文化仪式

贾静韵

曲江流饮、雁塔题名和跨马游街。古代学子在金榜题名之后，有三项文化活动极具仪式感，这就是



《琼林登第》图局部

(1256)文天祥20岁中状元，他在《御赐琼林宴恭和诗》中描写了琼林宴的盛况：“奉诏新弹人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唐歌气象还。”

元、明、清三代，因设宴地点不在琼林苑，故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但是宴会的流程和仪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琼林宴”。

元代赐恩荣宴于翰林院，元代诗人萨都刺《赐恩荣宴》诗曰：“内侍传宣下玉京，四方多士被恩荣。官花压帽金牌重，舞妓当筵翠袖轻。银瓮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赐御厨羹。小臣涓滴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

明朝设恩荣宴于礼部，明代诗人施槃有《恩荣宴诗》曰：“千里观光我独行，辞亲无奈惜离情。玉堂未拟登三辅，金榜先叨第一名。麟凤联袂欣道泰，车书混一仰文明。太平天子思如海，虎啸龙吟会匪轻。”

清朝沿袭明朝制，恩荣宴一般是在传胪次日举行，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宴会地点为礼部大堂。皇帝虽不会亲自参宴，但会钦派一名内大臣出席。另有读卷大臣、奎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等官员出席。朝中大臣与新科进士们觥筹交错，饮

酒赏景，畅谈未来，其乐融融。清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钱载有诗云：“日照槐阴覆露台，恩沾阙下萃鸿才。大官光禄铺筵定，小队和声荐乐来。却忆簪花过一纪，还因糊卷预三杯。升平盛事文明象，起向红云祝上台。”

慈恩塔下题名处

李肇《国史补》记载：“既捷，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名”，又称“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又一荣誉仪式。

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玄奘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张莒进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流饮后，与好友乘兴登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了“新科进士张莒”六个大字。张莒此举竟引起轰动效应，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自发地来到大雁塔题词，成为唐时风尚。也有说起源于唐神龙年间。

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

佳人争看状元红

唐人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所描写的骑马，指的是进士们骑马列队从大街上游行经过，而非状元跨马游街。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起源于宋朝。宋朝在沿袭唐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殿试制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

据《宋史·蔡齐传》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出了一道殿试题《置器赋》，让参加殿试的学子们论何为国之器。宋真宗阅卷时，蔡齐的答卷文笔优美，论述严谨，吸引了真宗皇帝，他尤其对文中“安天下于覆盂，其工可大”的语句大为赞赏，对身边的宰相寇准说：“得人矣，有安天下之意，此宰相器也。”说完，真宗宣名列前三四名者上殿。他见蔡齐身材伟岸，相貌堂

堂，对答从容不迫，举止端重优雅，甚是喜爱，当即钦点为状元。

宋真宗实在是太兴奋了，赏赐蔡齐御马一匹，供其乘用，并诏令禁军首领派7名宦官侍卫，专门为蔡齐在汴京跨马游街清道传呼，以表示对蔡齐的恩宠。蔡齐意气风发，头插双翅，身穿锦袍，由大内高手开道护卫，跨马游行于京御街之上。沿途百姓纷纷涌上街头观看，尤其是一些大家闺秀听说这名新科状元才貌双全，也跑出来远远观望，一饱眼福。科举状元“跨马游街”，蔡齐是获此殊荣第一人，为后世效仿。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后来延伸到全体及第进士，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根据当时的规定，状元、榜眼、探花三个人可以从正门出宫，而其余上榜的进士却只能从侧门出宫。在游街的时候，状元走在最前面，等到游街结束后，其他的进士要先将状元、榜眼、探花送回会馆，然后才能各自离去。

明代画家余士和吴铤共同绘制的《琼林登第》图记录的是隆庆二年(1568)32岁的徐显卿金榜题名后跨马游街和赴琼林宴的热闹情景。图中徐显卿身穿进士服(深蓝罗衣，深青绿边，圆领大袖)，头上戴着进士巾(与乌纱帽形制相近，左右展角，阔一寸余，长五寸余，垂有皂纱飘带，一对簪花，附有一对抹金银牌“恩荣宴”)，手执槐木制作的笏板。骑着一匹白马，踌躇满志，兴高采烈，两个黑衣皂隶为其牵马。前面一队仪仗，举着旌旗，抬着“进士及第”匾牌，吹奏着乐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画面的右侧为沿街院落，女子们有的掩门，有的在墙内登高观看热闹的场景，投去艳羡的目光。画面的左上方一童子牵着一头毛驴，一个落第的举子(或正在准备应试的举子)，投去的目光很复杂，或自惭形秽，或嫉妒，或羡慕，立志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光耀门庭。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对应这四级考试考中者分别为生员、举人、贡士和进士。在四级考试中殿试为最高一级考试，由皇帝“亲策于廷”。阅卷完成后，皇帝升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首先由内赞官传呼登第进士名次，而后鸣赞官接传。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被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殿试进士名次以黄纸书写，故称金榜。传胪大典后大金榜张贴于东长安门外，礼部堂官率状元及诸进士随出观榜，从金銮殿到长安左门，要经过太和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到天安门。而后顺天府备伞盖仪从护送状元归第，状元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春风得意很是风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徐州举子李蟠到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他自知份量小，随身携带了36个馒头进考场，以防肚饥。由于成绩优异，从而进入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他的《廷对策》全文3000余字无一差错，对军政、吏治、河防等答对贴切，符合事理，见解独到，且文笔流畅，气势磅礴。康熙帝大加赞赏，钦点李蟠第一甲第一名。李蟠簪花披红，跨马游街，鼓乐前导，伞盖旌旗，簇拥载道。沿途观者如云，万人空巷，大户闺秀或卷帘观望，或登楼远眺，欢声笑语。志满意得的李蟠骑在高头大马上，看到如此盛况，难抑兴奋心情，即兴赋诗一首：“十年辛苦对青灯，豪气染成万丈虹。笔架山头腾彩凤，砚池波内起蛟龙。马蹄踏碎长安月，玉管吹消紫陌风。十二朱楼帘尽卷，佳人争看状元红。”

去古代邂逅一场“曝书会”

雨霖霖

如今，人们常常能够见到各式各样的书展，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书籍。其实在古代，人们也有机会与“书展”邂逅。

家中藏书丰富的古人，每年都会定期“晒书”或“曝书”。所谓“晒书”或“曝书”，顾名思义，即将书籍或者藏书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这么做的原因也很好理解，避免书籍受潮或者被蛀虫损坏。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骄阳明媚的日子，大家都将自家所藏书籍搬出来晒一晒，并相互翻阅学习，这是不是与现在的“书展”有些相似呢？

晒书活动的起源时间很早。最早记载可追溯至西周典籍《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林”，说的是周穆公东游，在羽林这个地方“蠹书”，即晒去书中的蠹虫。

晒书可不是随便晒，而是一项技术活。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明确指出，“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可见，晒书可不是随意暴晒，而是在晴天将书籍放在风凉处“晾晒”。而且晒书的日子，从早晨开始晒，午后还得进行翻动，傍晚收起，必须等到天透后再收入书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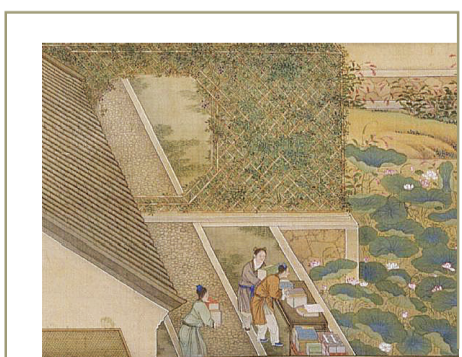
不过，古代“曝书会”的具体时间并不统一，也没有严格规定。总而言之，晒书必须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很多古代的“曝书会”都选择在夏季举行。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藏书纪要》中便提到“曝书须在伏天”，这个时候的日照充足，除湿杀虫效果最佳。东汉人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习俗然也。”这说明在汉代时期，七月七日便是一个晒书的好日子。

在宋代，“曝书会”极其受重视，甚至还出现了由政府主办的“馆阁曝书会”。“馆阁”是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馆阁曝书会”相当于宋代国家图书馆所举办的大型书展。不过，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汗牛充栋，非一日可以晒完，所以这项工程往往延续几个月。根据《宋朝事实类苑》中的记录：“秘省所藏书，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所谓“秘省”即“秘书省”，是宋代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从记载中可

见，在当时，五月至八月间，陆陆续续会举行不同的晒书活动。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晒书的时间发生了改变。《南宋馆阁录》中有如下记载：“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闳言：‘本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晒书的时间，由一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在“曝书会”期间，皇帝会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召集臣僚，一起前往“曝书会”现场观赏。而在书展期间的一日三餐，都由官府出资招待。这种传统始于宋太宗时期，《御定月令辑要》记载，宋太宗时“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局部

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晒，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后来，“曝书会”上“张筵”项目逐渐成为惯例，即宋代的“曝书宴”。《宋史》记载：“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宋代馆阁“曝书宴”自太宗朝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

对于“书展”，有些皇帝格外重视。宋仁宗嘉祐七年的“曝书宴”期间，不仅陈列各类图书古器任由与会者阅读观赏，而且还“题名于榜而去”，类似于今人参加活动，在“签名板”上留下

自己的名字。宋徽宗对于图书典籍非常喜爱，因此，他对于“曝书宴”也非常重视。《宋朝事实类苑》有这样的记载：“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最为盛集，前此未有。”说明这一年的“曝书宴”隆盛之至。

到了南宋，这种书展的规模更大，展出项目也逐渐增多。《南宋馆阁录》中有相关记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的书展，秘阁下设有方桌，上面摆放着御书、图画。而东壁的第一行陈列的是古器，第二三行陈列的是图画，第四行陈列着名贤墨迹，西壁亦是如此。东南壁和西南壁则陈列着祖宗御书。御屏后设有古器、琴、砚等展栏。此外，像“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内部藏馆也对外展出。与会人员还有免费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左氏》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即使应邀而未能与会者，主办方也会为其留下一套。

由于“馆阁曝书会”的级别高、层次高，展出的展品都是当时的稀世珍品，能参会的也多数都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们，基本上都曾在朝中担任过各类职务。所以，宋代的官办书展，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们。一年一度的“曝书会”，也成为一场文化盛宴。

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宋朝举办“曝书会”的传统。比如，元代馆阁晒书时间与南宋相同，在五月至七月。明代馆阁晒书时间改在六七月间，《明实录》中有“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酒食费之”的记载。在明代，“曝书会”期间最为隆重的是六月六日。《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曝晒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焉。”那阳时，每年六月六日，是晾晒皇家实录、御制文集等书籍的日子，因而这一天也成了一个大节日。

到了清代，馆阁晒书时间又有了大的变化，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据晒书的经验总结，认为夏季阳光强烈，纸张容易碎裂，根本不耐久。而且夏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就有可能遭遇巨大损失。因此，清代官方的晒书活动，一般定在三月、六月、九月，即分三次完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于自然气候认知的进步，人们也意识到，对于什么时候“晒书”“曝书”，也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清末学者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提到：“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所以，关于晒书时间，也应该以科学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尊重史实 秉笔直书

清风慕竹

下磕头，一边道歉，一边向桓大将军保证，回家马上让老爸删改。

当时孙盛已年届七十，他的家风极严，尽管儿子们有的头发都白了，犯了过错，也要在大厅当众训斥。估计是害怕挨骂，儿子回到家，立刻把全家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黑压压在孙盛面前跪了一片，“号泣稽首”，哭声震天。此时的泪水相信都是从小流出来的，因为那时的株连，是成百上千的亲属都要跟着掉脑袋的。

儿子边哭，边向孙盛祈求说：“您就为全家老少百口人的身家性命考虑考虑，高抬贵手，删改删改吧！”

面对家人快要流成河的眼泪，孙盛的反应是“大怒，不许。”断然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死也不干。

儿子们显然清楚老子的脾气，倔劲儿上来了，几匹马也拉不回来。退下之后，他们聚在一起，打起了另外的主意。你不是不改吗？咱们改，啻人的话写不过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话你还未必是对手。自古道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们的文字功底也不弱。挑灯夜战，不到几个时辰，一部戏说版的《晋阳秋》就搞定了，连夜送往大司马府，请桓大将军审定。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变了味，改了样，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可孙盛老爷子不是吃素的，他整天打交道的就是历史，看到儿子们突然改了动静，大的也不哭了，小的也不闹了，书房里的灯又亮了一宿，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姜还是老的辣。孙盛也没闲着，亲自把《晋阳秋》抄写了一遍，封存好，派人送给了前燕国王慕容皝，真实版的《晋阳秋》由此得到保存，而历史的真相也得以还原。

好的历史是用良心书写的，实在是它的生命。那些秉笔春秋的书生，看起来是如此文弱，可是在良知面前，他们却不惧生死，宁折不弯。历史的轨迹可以弯曲，文人的良心却不能拐弯。面对这样的翰墨书香，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历史随笔